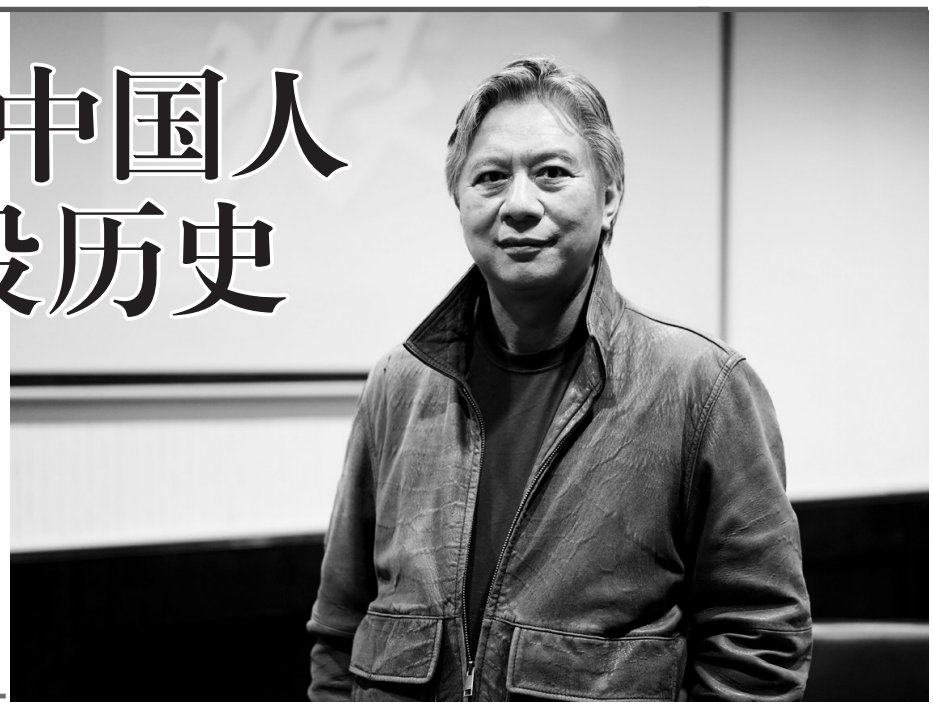
# 李杨: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义务讲述这段历史



面对面

有人说他是中国“最失败”的导演。自己掏钱拍电影,因为请不起演员就自己上阵,16年完成“盲系列三部曲”。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,当导演李杨带着南京大屠杀题材纪录片《痕》来到南京小范围放映时,27年前完成的真实影像画面仍震惊了专家和观众。

文|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　张楠
摄|　王涛

扫码看视频

## 作为一个中国人,有义务讲述这段历史

在《痕》中,史料呈现和专家剖析触目惊心,夏淑琴、李秀英、陈德贵、刘永兴、许自强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面对镜头讲述历史的真相,现在其中有的“时间证人”已经去世,还有人脸上添了许多岁月的痕迹。李杨告诉记者,再次看到自己的毕业作品由录像带“修复”与国内观众见面,感触很深。学生时代的作品并不完美,实际上公祭日前夕这两天,自己待在南京,一直在调整这部片子的细节和字幕。回想毕业那年刚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,由此产生拍摄关于南京大屠杀纪录片《痕》,作为毕业作品的想法。“我是一个中国人,有责任有义务把我们在战争中遭受的困难,客观地介绍给西方的观众。”

李杨决定拍一部纪录片,客观地介绍侵华日军在攻占南京时发生的行为。他为此在南京待了好几个月,去图书馆查史料,采访活着的当事人和知情者。为了保证片子的客观性,片中没有任何主观评论和解说词。片子是由对当事人的采访和亲身经历者的回忆,南京大屠杀时外国人拍摄的珍贵纪录片与照片剪辑而成。

李杨是西安人,来到同样是古都的南京,对南京的风光和绿色印象很深。20世纪90年代的南京风貌也被他记录在片中,小贩街头叫卖的街景如今已经看不到。“南京人特别热情,老年人讲南京话我听不懂,好多采访都是靠年轻人帮着翻译。”他还记得,当时在南京,由于有同学的帮助,省下不少费用,从拍摄到完成后期,都十分顺利。请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孙宅巍研究员等专家帮助梳理史料,还找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,很多资料通过购买版权获得。“我就是留学生,当时比较困难,可能是我自费拍摄的行为打动了他们,所以没有遇到任何障碍,特别幸运。”当时在德国科隆大学留学的李杨通过勤工俭学,打工赚钱拍纪录片,学校提供了部分后期制作的费用。他还提到,一位同在德国留学的韩国朋友,听说这部片子是拍南京大屠杀的,就免费帮他作曲。

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们把讲述历史,视为自己肩上的责任,希望带动更多人珍爱和平。但在上世纪90年代,面对镜头,老人们不愿意回忆那段惨痛经历。“采访夏淑琴,我请求了她好几次,但她不愿意说,因为讲述这段经历,会让她半个月一个月都缓不过来。所以,他们害怕,不愿意揭开伤疤。”同时,李杨说,“我们当时在街头采访年轻人发现,他们中有些人对南京大屠杀并不了解,这让我很震惊,联想到我在德国留学时,也遇到德国人完全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,甚至连历史学家也不知道。这都让我在震惊之余,更加坚定了完成这部片子的决心。”

后来这部纪录片被德国电视一台收购,并作为纪念二战结束50年的系列影片之一,在德国和其他国家播放,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还入围了德国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影片单元,并获得提名。李杨回忆说,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听说有一个中国留学生自己花钱拍了《痕》这一部纪录片,大使馆文化处还奖励了500马克。“我用这笔钱,添了一点举办了一个很大电影party,并在母校科隆电影学院放映了《痕》,以此纪念二战胜利五十周年,同时庆祝硕士毕业。”李杨还记得,那天请了很多中国和德国的朋友,为了赞助他,开中餐馆的好朋友老范做了很多菜,只收成本费。遗憾的是,当时中国还没有纪录片频道,没有机会在国内放映。

## 哪怕自掏腰包也要圆电影梦,关注现实的“盲系列”影片

除了《痕》,李杨还拍过《妇女王国》《欢乐的绝唱》两部纪录片。但许多观众了解这位导演,应该是从《盲井》《盲山》《盲·道》构成的“盲系列”影片开始。耀眼的明星,宏大的场景和华丽的特效,这在他的片子里都找不到。有的是带有纪录片特点的真实。

从两岁在《延安游击队》中出镜触电大荧幕,直到44岁完成处女作《盲井》,他才圆了自己追求多年的电影梦。硕士毕业后,第一想法就是要拍故事片。于是他放弃在德国的优厚待遇,回国创业。李杨说,当时自己曾处于一种选择的焦虑状态中,拿着毕业证和简历去了电影制片厂,可是那个时候电影市场不景气,电影制片厂一年最多拍一到两部电影,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充斥着录像厅。

听说王超和贾樟柯用很低的成本拍了电影,李杨眼前一亮,觉得自己也可以掏钱拍电影,但对于国内市场和生活现实的不了解,也一度让他的电影梦变得不切实际。2000年,41岁李杨成为第五代导演黄建新的副导演,在剧组实践的机会,积累经验,对于他后来拍电影很有帮助。他彻底决定回到国内,结束了在德国14年的生活。

在北京租公寓住下来,他在北京朝阳区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,没事就骑车去那里看书,寻找适合改编电影的小说。作家刘庆邦写煤矿生活的中篇小说《神木》打动了他,“对善与恶,对人性纠结与挣扎,对金钱与道德,邪恶与善良的描写非常深刻,这正是我通过电影想表达的东西。虽然我名不见经传,但我有信心把它拍好。”李杨把在德国辛苦打拼来的钱投进这部电影。小说写的是最底层的煤矿矿工,没有女主角,场景又不在城里,拉不到赞助,不少大导演都没有兴趣拍这个题材。

李杨导演跟别的导演不一样,他的电影是自己掏钱拍。李杨还记得拍完《盲井》之后,“给大家发完工资,给各个器材公司付清账款之后,我就变成了穷光蛋。不但一贫如洗,还欠着澳大利亚电影后期公司的钱。因为拍摄期间发生的各种状况,被迫停机、转场,换演员和工作人员,拍摄周期多出了七八天。这对于一个低成本电影制作来说,是非常致命的。”

然而他坚信,“一个人做事情贵在信守诺言和坚持不懈。事情做完了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,但是半途而废只能走向失败。”李杨告诉记者,“盲”系列告一段落,“那一年时间特别难熬,接下来,自己要抓紧时间把想拍的东西拍出来,毕竟年龄也不像二三十岁。如果有其他电影让我去演,我也会演。”

## 骨子里有点“疯”,为学电影十年上了四所大学

追求电影的学习之路,李杨走得挺艰辛,花了十年时间,在中国和德国上了四所大学。李杨出身艺术之家,父母都是陕西人民艺术剧院优秀的演员。父亲李诗镕1961年主演的电影《延安游击队》中,李杨就出演了那个两岁娃,那时候就种下了电影梦的种子。在舞台边长大,从小就安安静静地看父母跟叔叔阿姨们排戏。玩过家家也是角色扮演,模仿大人排练话剧。

直到他发现,导演才是电影的灵魂,所有演员都要受他的支配和调度。“演员很被动,没人用你,你就没事。所以想着能多找一个饭碗吧。父亲教育我说,艺不压身,多学一个东西,总是有好处的。就开始学写剧本,做导演等等。”

年轻时,梦想着有天能做导演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到推荐信,离开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(国话前身之一),自学考到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导演专业。李杨说,“当年我都已经在国家话剧院工作了,在话剧圈可以说是最高殿堂了,但我觉得光做演员不够,还想上学。我就把分房、提干都放弃了,去考了大学。”

李杨同学回忆说,这个看起来儒雅的帅小伙,其实骨子里有点“疯”。在新生运动会接力赛上充当最后一棒,为只有6个男生的导演班夺得冠军。被理工科学生欺负时,李杨会在推搡之时大喊一声,“来,我们两人打你们10个!”更为离谱的是,大学念了两年,李杨突然退学,和当时的女朋友一起出国留学。当时不光没和家人说,能否拿到签证都还不知道就去做了。

到了62岁的年纪,李杨说自己心理年龄是90后。“我尽量跟年轻人合作,他们给我带来很多活力和新的想法。时代发展速度很快,不能保守成规,你看元宇宙都出来了。当然我不懂这个概念,先看看,向年轻人学习。”

### 快问快答

Z = 张楠　　L = 李杨

Z 再演《盲·道》,对自己的表演满意吗?

L 不满意,20多年没演戏,毕竟状态不容易找到。就像20年没有骑摩托车,重新骑肯定摇摇晃晃。但我也没什么钱,从别的上面赚一点钱,就投到电影里。请不到演员,自己来演可以省钱。

Z 最近,电影《亲爱的》原型失散多年的儿子被找到,此类新闻您关注吗?

L 新闻报道很多,但你要真正呈现成电影,比较困难。很多投资人不愿意投这样的电影,他们更愿意投《你好,李焕英》这样的片子。像我拍的那些片子,不会被投资。

Z 参与到院线电影的制作中,未来会有更多尝试吗?

L 会的,有一部江苏出品的电影《不服》刚刚拍完。改革开放江苏走在全国前列,这里是电影素材富矿,有很多小说家,南京大屠杀题材也可以多拍很多电影,我们拍的还太少。

Z 什么样的题材会打动您?

L 跟当今政治环境和艺术环境吻合的。题材要打动我,故事要动人,否则没有吸引力。不是说以煽情为目的,必须是有意义的故事,人的生命很短暂,要多做有意义的事情,不是什么赚钱就奔着什么去。